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4.4

4 issues a year in 14 languages

ISA的65周年

Margaret Archer,
T.K. Oommen,
Immanuel Wallerstein,
Alberto Martinelli,
Piotr Sztompka,
Michel Wieviorka

意大利劳工

Mimmo Perrotta,
Devi Sacchetto,
Luisa Leonini,
Alessandro Gandini

大学危机

John Holmwood

- > 黎巴嫩的宗派主义
- > 埃及的吉普赛人
- > 法国的跨国恋人
- > 土耳其的抗争幽灵
- > 哈萨克的媒体
- > ICSU 和地球的未来
- > 罗马尼亚团队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4卷 / 第4期 / 2014/10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GD



> 主编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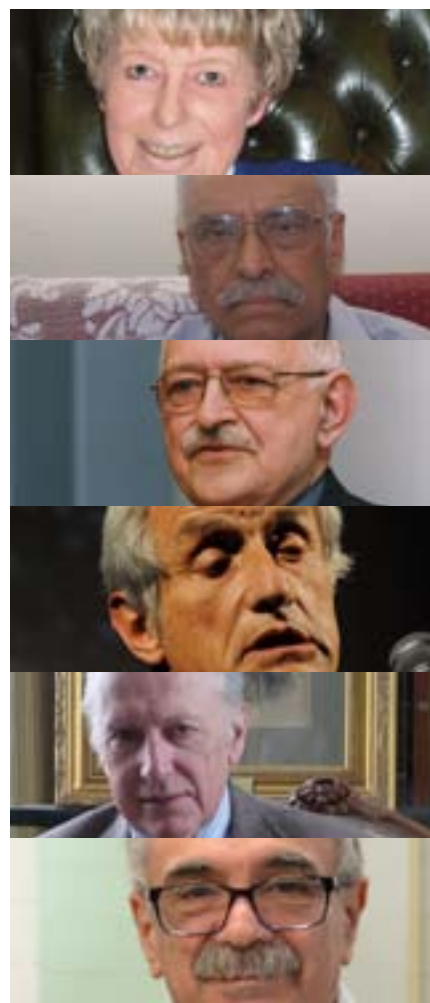
ISA的65週年

为了庆祝 ISA 的 65 周年，横滨大会邀请到了前会长来回顾以前和放眼未来。他们的发言在这期全球对话中刊出。他们批判了英语做为通用语言的缺点，并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讲双语。而规模越变越大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有的人认为很好，有的人却很担忧。Immanuel Wallerstein 回忆到其第一次的大会上，那是 1959 年。那时的知识交流相当紧密，几乎都是知名的社会学家参与，但是也都是来自全球北方。Margaret Archer 则认为包容性改善很多，还要继续前进。但她也批判研究委员会的增多，让 ISA 巴尔干岛化，也妨碍了发展更全面的社会学观点。部份原因是专业化的深化，也就是注重 IF 和 PI 的结果，让很多研究其实很肤浅。的确，John Homwood 也批评了学术评鉴审查的文化。

这也是 Michel Wieviorka 讨论的议题之一，他讨论过度专门化的危险，以及数字化的挑战。其认为社会学研究不可忽略现代性的恶。T.K. Oommen 讨论了全球社会学的阻碍：民族国家的预设，并认为我们必须把民族和国家分开，并且期待可以超越国家的力量。Piotr Sztompka 则把全球化视为是“很多个世界的一个社会学”，并批评那些把政治带进社会学的人，不论是革命者或是本土社会学运动。最后，ISSC 的新会长 Alberto Martinelli 则讨论社会学可以为全球气候变迁所贡献的地方，以及全球的民主治理。

这些都是顶尖社会学家的声音，为社会学提出针砭和把脉。但是全球社会学已经再次讨论了年轻社会学家如何在面对挑战时展现创意和勇气。这期也讨论了意大利的移工和意大利青年怎么面对经济危机。也讨论黎巴嫩的宗派主义和烟草农在战争区的生存。此外，有篇文章讨论埃及的吉普赛人，也有文章讨论法国的移民，以及土耳其的 Gezi 抗议。另外有论哈萨克的媒体的现况文章，还有自然科学家怎么处理地球生态问题的文章。总之，尽管会长们提出批判和警告，但是社会学依然相当尽责，持续告诉大家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ISA的65周年：回顾与展望



Global Dialogue is made possible
by a generous grant from SAGE
Publications.

全球对话以 14 种语言刊出，请至 [ISA website](http://isa-berkeley.org)。

投稿请寄给 burawoy@berkeley.edu

> 编辑团队

主编:

Michael Burawoy.

执行主编:

Gay Seidman.

副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y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Rafael de Souza, Benno Alves.

哥伦比亚: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Katherine Gaitán Santamaría.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Nidhi Bansal,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Zohreh Sorooshfar, Abdolkarim Bastani, Niayesh Dolati, Mitra Daneshvar, Faezeh Khajehzadeh.

日本:

Satomi Yamamoto, Yusuke Abe, Yuri Hitomi, Yutaka Ito, Seijiro Katayama, Koki Kawakami, Ayaka Komiya, Masahiro Matsuda, Masakazu Matsuzaki, Yuka Mitani, Nami Morodome, Hiroki Nakamura, Masaki Okada, Takazumi Okada, Yukari Sadaoka, Fuma Sekiguchi, Kohei Takejiri, Misato Tsuruda, Kazuki Uyeyama, Wataru Wada, Tomoko Wakiya, Kasumi Yamauchi, Sakiye Yoshioka.

波兰:

Mariusz Finkielsztajn, Weronika Gawarska, Krzysztof Gubański, Kinga Jakieła, Kamil Lipiński, Przemysław Marcowski, Kuba Barszczewski, Martyna Miernacka,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Adam Müller, Zofi a Penza, Konrad Siemaszko, Anna Wandzel, Hanna Wierzbicka, Marcin Zaród.

罗马尼亚:

Cosima Rughiniş, Ileana-Cinziana Surdu, Telegdy Balazs, Adriana Bondor, Ramona Cantaragiu, Miriam Cihodariu, Ruxandra Iordache, Andra Larionescu, Mihai Bogdan Marian, Monica Nădrag, Mădălin-Bogdan Rapan, Alina Stan, Oana Mara Stan, Elena Tudor, Cristian Constantin Vereş.

俄国: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Asja Voronkova.

台湾:

何經戀

土耳其:

Yonca Odabas, Günnur Ertong Attar, İlker Uurlu, Zeynep Tekin Babuç, Hüseyin Odabaş.

媒体顾问: Gustavo Taniguti, José Reguera.

编辑顾问: Ana Villarreal.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 ISA的65周年

2

> 前會長們回顧與展望

世界的社会学

4

by Margaret S. Archer, UK, ISA 前会长1986-1990

全球社会学的前提

6

by T. K. Oommen, India, ISA 前会长 1990-1994

ISA作为组织: 成长的隐忧

8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USA, ISA前会长1994-1998

ISA对全球民主治理的贡献

10

by Alberto Martinelli, Italy, ISA 前会长 1998-2002

实证主义宣言

12

by Piotr Sztompka, Poland, ISA 前会长2002-2006

数字化、学科性、恶

14

by Michel Wieviorka, France, ISA 前会长 2006-2010

> 意大利劳工

意大利南部的移工

16

by Mimmo Perrotta, 意大利

罢工反对合作社

18

by Devi Sacchetto, 意大利

面对经济危机

20

by Luisa M. Leonini, 意大利

自由职业的兴起

22

by Alessandro Gandini, 意大利

> 黎巴嫩

黎巴嫩宗派主义动态

24

by Rima Majed, 黎巴嫩

在战争区种植烟草

26

by Munira Khayyat, 埃及

> 危机中的大学

高等教育的评鉴审查

28

by John Holmwood, 英国

> 被歧视的外来者

埃及的吉普赛人

30

by Alexandra Parrs, 埃及

跨国恋人

32

by Manuela Salcedo and Laura Odasso, 法国

> 政治和媒体

土耳其的幽灵

34

by Aylin Topal, 土耳其

哈萨克的民意操弄

36

by Almas Taizhanov, 哈萨克

地球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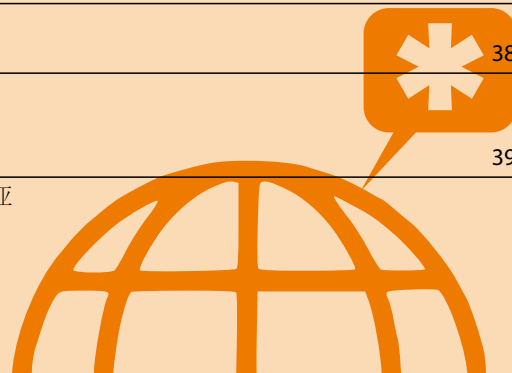
38

by Emma Porio, 菲律宾

罗马尼亚编辑团队

39

by Ileana Cinziana Surdu, 罗马尼亚



> 全世界的社会学

by Margaret S. Archer, University of Warwick, 英国, 前ISA会长, 1986-1990



Margaret Archer.

有 所谓完美无瑕的视野。从最一开始，我当会长的看法，是透过 UNESCO 的角度，也就是 ISA 是成立来帮助“联合世界上的社会科学家”然后让这个学科前进。65 年过去了，在“高”与“低”现代性的分野中，ISA 本来可以按照这个逻辑去组织的，但是实际上 ISA 却没有这么做。ISA 反而从一个由下而上的会员视角出发，形塑了历史，并超越了结构和文化的限制。回顾过去，似乎在时间分期和 ISA 的历史上有着重迭。善意没有缺少过，不过预测却似乎是少了些。

而让 ISA 没有站在精英知识立场上、反而以更全球整合的姿态而组织起来的原因是什么？我下面要说的是由我的经验所出发来立论，这要从 1966 年的世界大会说起。那次大会

在 Evian-les-Bains，这刚好就是我现在正在写这篇文章所在之地的 6 公里之外。就像那个地方一样，那次大会规模很小，与会者彼此都认识，几乎都是欧洲人。而美国的影响也很强，可是最活跃的却是来自东欧的移民。我们很有趣地邀请了 KGB 的人来参加，但是没有什么火花就是了。

这一切可能要归因给语言霸权。多数北美的学者，包括英国学者，都只会一种语言。而沟通的基础也是一个障碍，像是手动打字、没有复印机、不安全的电话和邮件等等。在 60 年代末，我那时是 *Current Sociology* (1973) 的主编，那是一个 Trend Report 的引用文献，必须用一大箱包裹起来的档案和卡片来编辑。我在古老的 Remington 上打字是很快乐的，不过更重要的是，为什么 Trend Report 是重要的呢？因为早在网络时代以前，唯一类似的来源是 *Sociological Abstracts*，这也要谢谢 Leo Chall 和他老婆的付出。我称这个时代是冷战时代。

> 经验主义联合了冷战学者

的确，社会科学哲学支持了经验主义，并且当其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却意外地联合了东方和西方。西方国家则在第一台跟一个房间一样大的计算机问世的时候开心不已，这是所谓巨量数据的开始。在东欧，细致的统计研究躲开了政治正确的审查。此外，统计也代表了一种世界语言。在 1970 年代的大会中，几乎所有的 session 都开始看到回归数据表，开启了类似数学的讨论。

这不代表理论已死。相反地，Uppsala (1978) 的一场著名的辩论：Parsons 和 Althusser，至少数百名学生从滂沱大雨中走到很远的一间教室去听这场辩论。而当主持人宣布很可惜两位讲者都没能前来时，大家落寞地离开了。

ISA 并不缺乏善意。我们审慎地在东欧举办的执行委员会，从 Bulgaria, visited Tbilisi, Ljubljana, Budapest 等地方偷偷地把文件运出来。透过不断地造访波兰，我们结交了许多朋友。

>>

那个时代国家学会还是 ISA 的主力时，我们在共产党和波兰个人会员的关系表面上小小推了一把，而在 Jablonna 的盛大款待下，我们其实很担心这可能是我们同事一个月的食物花费。厨师说要款待，并在星期四给我们 zrazy zawijane，不过虽然整个下午都闻到食物的香味，可是晚餐迟迟没有来。最后，我们看到从 Warsaw 来的车子，而厨师则告诉我们这个是教育部的晚宴，不是我们的。总之许友谊还是长存，在 1989 年，许多人喜欢到 Gdansk，然后当团结工联解开卸扣时，我们则待在造船厂。

> 墨西哥来的警示

ISA 对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其实很友善，可是却忽视了被压迫的群体。ISA 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北美的自成一格，其实很少人对于其他的大陆有什么深刻的认识。当然也有例外，Tom Bottomore 对于印度和 Alain Touran 对于拉丁美洲的丰富知识。而 1982 年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大会，我们很惊讶墨西哥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的学生对于参加世界大会是那么的踊跃。我们设立了特别场次，不过学生们说：“你们来到我们的国家却不说我们的语言，不关心我们的议题？”所以我们知道了。而 Cardoso 也被选为会长。虽然这也是在西班牙被列为 ISA 官方语言的很多年前的事。

而在 1986 年于 New Delhi 的世界大会，Martin Albrow 和我已经发行了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的期刊作为延伸用。Daniel Bertaux 纳入了一个地理和语言都包容的年轻社会学家竞赛，包括了 14 种其他语言和场次，让大家畅所欲言被边缘化的感觉和经验。而西班牙文最后变成了官方语言。我们的 1990 大会是“全世界的社会学”，我们会长也说也是这个主题。多数的执行委员认为我们正在国际化的进程上。但我却没有让另外一小部份纳近来，那就是越来越重要的研究委员会。

> 20 年的巴尔干岛化

一开始，研究委员会的专长似乎是合理的专业社会学家的世界观，有各种兴趣。当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却没有考虑到碎裂化的问题的时候，两个非预期后果相互产生了。第一，有些研究委员会排除其他方法，独尊一种教条。第二，研究委员会太多了，但是缺少社会学家去研究晚期现代性，且许多人并不满意。总之，ISA 提供了越来越少的讨论机会去讨论“我们要去哪里？”

> 未来展望

当研究的官僚管制越来越多时，新的衡量指标越来越多，充斥着学术界。这些代表着早期的学者学习了很不成熟的学科分也去定位自己，若是他们有做过田野，就不会这样。而发表的压力和大家挤破头要去把 CV 弄得很好看很满的趋势也让人做研究的时间越来越少，不写书，更不用说真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同时，世界议题的讨论平台也没有。议题像是欧洲的脉络，全球暖化，不平等恶化，财金的资本主义和文化公共的数字保证等等，都没有讨论。而对于新自由主义或是没有另外一个世界等的观点也没有机会去辩论。

新的执行委员组成相当国际化，这可以在巴尔干化前提之下巩固全球的代表性，也可以形成新的国际研究纲领，去处理全球议题，解释这个世界走向何方。我曾经觉得作为前任会长，最好的角色是不要发言，可是我后来改变了这个想法，毕竟，我们都有责任与特权，只能让这个组织更上一层楼。■

来信寄给 Margaret Archer <Margaret.Archer@warwick.ac.uk>

> 全球社会学的前提

by T. K. Oommen,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New Delhi, 印度, 前ISA会长, 1990-1994



T.K. Oommen.

ISA 成立的目的是推动国际的社会学，可是我们对于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还没有达成共识。当然，有可能的一种看法是各国社会学的累加，但是以人口学的角度来说，国家有很大的相异性，因为有超过 10 亿人口的国家（印度和中国），也有 5 百万人或更少的国家。此外，社会结构和文化也是因国家不同而变化很大。有些国家是多民族所组成的，有些是多族群的，有些则是多个部落所组成。有些是典型的民族国家，有些则是想成为民族国家。若要把这些不同的基础当作是全球社会学的前提，那会很难。不过这似乎是 ISA 要做的事情。

就像 Bauman 所说的，“社会其实就等于民族国家，我想这没什么例外，不论是概念或

是分析的工具，都是如此预设的”。而第一个建立全球社会学的前提就是去放弃民族国家作为分析的基础，也就是要同时避免方法论的民族主义，因为理想的民族国家是很难存在的，就算在孕育诞生的西欧也是如此。可是社会学家不能把社会流动、全球网络、多重社会空间等概念来替换社会的概念，因为没有社会，这些都不会存在。

第二前提是要克服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之间的分界，若是人类学去分析低劣的后者，那社会学则是研究现代、工业的社会。如 Fallding 说的，“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其实就是研究原初人类的社会学”。若坚持社会学是现代性的产物，那只会忽视了多重现代性的存在。

智识上的二元对立也在冷战时代演变成三元结构。这是因为是由政治经济学为基础所造成的，此处也影响了社会文化结构。第三世界被描述成为开发、人口过多、政治混乱的地方。而第二世界则是科技上是现代但是政治上威权，而第一世界是现代的、科技上有效的、民主、经济发达的。

但是以社会结构和文化的角度而言，第三世界包括了三个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从非常不同的殖民经验所得来的。若是非洲和南亚是被撤退的殖民主义所包含，那么拉丁美洲则是经验了复制的殖民主义，包含了许多不同族群背景的移民。这些族群在同一个国家的领土上相处，并没有成为欧洲的民族国家典型。社会学家则是没有办法挑战冷战的三元世界结构观点，继续把我们对于迁占者社会的理解过度复杂化，这之中包括的第一和第三世界。

国家和民族的交迭是常见的一种概念结合，也是全球社会学的最大阻碍。“民族传统”在社会学中总是指向在国家边界内所从事的研究成果。在柏林围墙被建立之前，以及倒塌之后，德国社会学只有单一民族传统。可是要知道的是，有好几十年的时间，其实是有两个传统的。在第二世界苏联社会学瓦解之前，其实他是包含好几个国家的社会学的，但是要到了苏联解体后，他们才被承认。

把社会学和民族国家连结起来是和这个学科的本质相互冲突的。社会学分析各个社会结构和文化，不论现代、前现代、简单、复杂、农业、工业等等。若社会学对于多元还有兴趣的话，民族国家则是对于同质化有兴趣。所以社会学的灵魂和民族国家是相反的，但是现在被锁进同一个身体里面，让社会学的国际化无法实现。

再者，把社会学和国家连结是对民族很有问题的，因为有些民族其实还没有成为国家。有所谓的法国社会学，但却没有布列塔尼半岛社会学；有英国社会学但是没有韦尔斯社会学。有西班牙社会学但是没有加泰隆社会学，有库德族人，分布在许多国家，但是似乎很难有自己的社会学。而国家社会学的命运似乎也不可避免地和一国的政治有关，若没有民族国家，就没有社会学。我们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意义的谈论国际社会学吗？

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们已经看到民族国家的没落了。第二世界的解体似乎让人觉得地球村时代来临了，而全球社会学也似乎快要诞生了。但这发生在政治和经济上，在社会和文化上并没有。所以说有个统一的全球社会学诞生了，是很不切实际的。但是，因为单一的交

流沟通组织的确存在，有些人期待一个世界社会的诞生，可是就我看来，这有点像是在纯科学之后去创造社会学的那段历史一样。在我的第十三届世界大会会长致词中指出的一样，20年前我就说过：“若世界社会是所谓的一个文化、一个文明、一个沟通系统，那么这不但不可可能，也不可欲。”

我用两个观察来总结我这篇文章。第一，尽管人类社会转型了，但是有三个面向是共享的：同一性（哲学领域的论证），多元性（社会学所称），社会过程（文化多元论者所述）。这些面向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面貌，可是都基本上存在。这些提供了国际社会学的希望。但是与其聚焦在这些基本面向，社会学仍须解释政治、经济、科技、媒体、生态等等，把结构和文化关联启来到更多的领域。

第二，社会复杂性的变化来自于阶层化、异质性、层级，而比较少来自经济发展或是政治体制。人类社会是以阶级、性别、年龄等等所分化而成，而且当这些在文化上越来越不同时，特别是宗教、语言、民族时，重迭性导致了更复杂的体现。全球社会学必须追求理解相同性和相异性，避免普世主义的同质化危险，以及本土主义的狭隘视野。的确，比较社会学是迈向全球社会学的一扇大门。■

来信寄给 TK Oommen <tkoommen5@gmail.com>

> ISA作为组织 成长带来的隐忧

by Immanuel Wallerstein, Yale University, 美国, 前ISA会长, 1994-1998



Immanuel Wallerstein.

我 参加的第一个 ISA 世界大会是第三届在 1959 年于 Stresa 举行的，那是意大利的北方小镇。自那时候起，我参加了 15 届的其中 13 届。若要说说我的感想，我可以比较一下 1959 年的大会和我担任会长时期的大会 (1994-1998)，以及今日的大会。我希望可以从 4 个方面来讨论这个组织的发展：大会参加者的组成、语言、ISA 的结构和议程、规模的影响。

> 参与者的组成

官方对于 1959 年大会的数据显示参与者有 867 人，而发表的大概有 300 人，多数是欧洲和

北美学者。我记得只有一个从第三世界来的活跃学者：埃及的 Anouar Abdel-Malek（但是他在 Paris 工作）。这也是第一次有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人来参加的大会。多数是哲学家，但是地主意大利的与会学者的也很多这是哲学家。社会学是新的领域，ISA 扮演了催生者的重要角色。

而我担任会长的时候，参与这更加国际化。但是，分配还是不平透，因为与会的支出让许多国家的人无法前来，即使很多国家都有社会学了。

2014 的大会参与者在 ISA 的努力下，虽然不尽理想，但是更为平均了。一项很大的进步是女性参与者和发表人。我想未来为继续进步下去。

> 语言

ISA 的一开始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1959 年法语是广为被使用的，可能使用的人数还比人数远超过的 2014 年还多。那时许多参加者即使不能说，也可以听得懂法语和英语两者。而且除了额外场次以外，不需要翻译。

在地一次第三世界举办的大会是 1982 年的墨西哥。当然那时有许多墨西哥参与者，也有许多拉美学者前来。而法语和英语的使用让墨西哥的参与者不满，要求讲西班牙语和翻译。Alain Touraine 透过把英语和法语翻译到西班牙语抚平了一些不满的情绪。而西班牙文后来成为官方语言。

可是，除了一些很少数的场次，英文变成了唯一真正在交流的语言，因为若场次是法语或是英语发表，那英语的听众就会跑掉。当我是会长时，我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而这个委员会是 Alain Touraine 所组织的。他们做出了建议，可是却被忽略了。

而部份原因是国际的参与提升，有更多的

人其母语不是这三者的其中之一，而对多数人而言，英语是第一个“第二语言”。这和世界体系的美国霸权有关，而早期的世代学习法文、德文、俄文等当第二语言，可是年轻人则是英语。

就像任何的国际组织一样，ISA 有世界语言的负面影响。比较不好的世界语言被使用，而说与写的版本又有很多。另外，当美国衰落，会要求有其他的语言：若是中文和阿拉伯文变成科学沟通的大宗时，ISA 怎么调整？

＞ ISA 的结构

1959 年，国家学会委员会的代表选出了执行委员会。当苏联也加入后，这个变成了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台面下交涉。

此外，当时也只有两个研究委员会。他们是真正的研究委员会，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辩论理论，而是真这的做跨国研究。大家不可以自由加，而要接受邀请。结果，后来委员会数量增加很多，有 4 个人就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的例子。

ISA 结构的主要任务是选择下个大会的地点和议程。一位副会长负责议程，并且和议程委员会讨论，而没有成员是 ISA 委员会的成员。这相当不同！这是为了增加成员的多元性，而且会长甚至也不参加议程的讨论。

而几十年下来，ISA 设置了许多副会长，但是我任内的时候议程副会长还是最主要的副会长，Alberto Martinelli 则组成了委员会，但是其他副会长也会受邀。在某个时间点，议程副会长的主要地位被研究委员会所取代了。而最后，议程这项工作变成是执行委员会的责任了。

我相信这是 ISA 会后悔的一项决定。不同于让 ISA 成员选择兴趣所在，现在变成了让许多派别的兴趣来决定议程和时间分配。若是执行委员会被某个派别所把持，那真正整合的议程就不可能诞生。若是执行委员会分裂，那就会停止运作。我希望 ISA 可以回复到之前的方式，让议程副会长有这个权力和独立性。

＞ 规模的影响

增加出席的正面影响和地理分配是很明显的。ISA 成为了更包容的组织。可是包容也可以是排他的。1959 年所有参与者都是重要

的。小规模会议有着真正的知识交流。

但是一旦有了 6000 人，大量的研究委员会和特别会议增加了，没有了真正的知识激荡。一个场次有 4 或 5 篇论文，只有最多一、两个问题的响应。许多参与者是被动的。

想要真正有辩论和合作的空间的必须是小型会议，而且是在大会之外。我们所有人的精力都有限，时间也有限，金钱也有限。大规模促进包容性，但却没有提升参与性。我想这问题很难解。或许可以有些场次是小群体的，自我组织的，没有论文但是有辩论进行。不过要组织这种型态的会议很难，或是太过于乌托邦。但是这也再次强调了议程委员会的重要，组织不应该只是少数特定兴趣的维持而已。■

来信寄给 Immanuel Wallerstein <immanuel.wallerstein@yale.edu>

全球民主治理的贡献

by Alberto Martinelli, University of Milan, 意大利, 现任国际科学协会会长，前ISA会长, 1998-2002



Alberto Martinelli.

回首过去，社会学和ISA有的长足的进展。放眼未来，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让其更加国际化。推动国际全球社会学一直是ISA的主要目标。历任会长也多所贡献，我的任期是1998-2002，例如我就成立了博士生的实验室，是个持续成长的努力，并且在这次横滨大会就看得出来。

可是，还可做得更多。有两个原因我认为ISA应该继续努力。首先，全球

社会学的成长可以改善社会学研究的质量和更贴近社会。第二，ISA可以替全球民主的治理做出贡献（和其他国际社群合作）。

社会学作为科学主要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可是就像ISA一样，已经全球化了。社会学提问的核心在于基George Simmel所问的：社会如何可能，以及合作怎么样让人们的基本需求满足，还有社会再生产怎么保证持续，另外冲突怎么解决。这些是古典思想家主要的关怀，也是ISA的社会学家的关怀。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不过现在可能要从全球的层次上发问，变成了更困难的问题，因为21世纪的社会世界是个单一又分裂的世界。

古典社会学家有全球的视野，包括不论像是世界经济的理论家如马克思或伯瑞图，或是比较社会学家像是韦伯或涂尔干。可是后来的时代，也就是我在Berkeley念书的60-70年代，专业社会学越来越限缩在国家边界里面。这个态度已经不再可能了，因为当代的全球化不但指

出世界是新的研究对象，并且需要任何的领域（如在欧洲或是非洲的家庭，或是在中国或是巴西工厂的劳动关系），不但要比较，还要放到全球的脉络里面，每个地区都和其他地区有交织在一起，Glocal不再是字典上的名词而已了。

今日和明日的社会学不但要全球化，还要科学与批判，需要有明确的认同，但也要开放和其他的社会科学和物理与生物科学合作。这个是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 (ISSC) 的目标。这是全球社会科学组织和国家学会的母体组织，我作为会长，主要任务是希望发展真正的科学合作，而刚发表的 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提供了丰富的图像去描绘社会学的研究状况，特别是在环境领域。这在网络上可以读取，很值得一读。而第三世界社会科学论坛（在 Durban 于 2015 年举行）的主题是全球正义。我诚挚邀请所有的社会学家参加，这和千禧年发展计划的评估会同时进行。而五年其的环境计划 Future Earth 也会由 ISSC 和 ISCU（自然科学）一起进行。ISSC 会特别负责子计划 Transformations to Sustainability。

ISA 本身，和 ISSC 或是 ICSU 一样，是个全球的角色，在知识推动和技术发展上都是。而在全球化的不同面向上也要建议有

效的议程，像是不平等或是全球正义。这样和其他科学组织一起，ISA 可以对全球民主治理有须多贡献。第一，多数具有影响力的全球行动者，像是政府、跨国企业、基本教义组织、民族主义运动等，都是被自我利益所激起的，也被权力或是资源所吸引，要去采用单一的世界观。每个人都被科学成就、教学能力，专业伦理所评量，而非性别、族群、年龄、国家等等。第二，国际科学组织可以是有效的方案对抗教条主义和盲目。我们习惯了各种不同甚至冲突的观点，提出矛盾的意见，为了去让一致性和经验检验更公平。科学的论述是反对教条和普世真理的。第三，虽然贸易的便利和外交的需要让政府和企业故意忽略人权的侵害，国际的科学组织可以扮演更重的角色。ISA 已经扮演了很好，要会继续下去，特别是在辩护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教学与科学研究自由的面向上。第四，国际科学组织虽然有着霸权文化的语言的影响，但似乎更知道种族中心主义的危险。

这些是一旦相关有效的方法，让 ISA 和其他科学社群可以对全球民主贡献心力，也可以对抗经济 and 文化的宰制。但是若要更有效的话，这些组织必须要有很多会员，支持其

计划与活动。

ISA 有着特殊的角色，因为社会学就是要去探究当代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去帮助人类可以活在和平的世界，去在多元中找到相似性，去维护正义、自由、文化多元。社会学的任务，那会是很重要的一步，所以社会学家可以对于这些目标有更多的贡献。今日的世界充满冲突，所以需要社会学家，而且危机的社会特别需要好的社会学家，因为短视近利的领导者也需要我们。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来信寄给 Alberto Martinelli
<alberto.martinelli@unimi.it>

> 实证主义宣言

by Piotr Sztompka,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Krakow, 波兰, 前ISA会长, 2002-2006



Piotr Sztompka.

你相信吗？横滨世界大会是我的第十一次大会。我1970年加入ISA，那时的大会是在保加利亚的Varna，是第一次在东欧举办。40年过去了，我放眼过去、展望未来，作为理论家，我习惯看大方向。我看到两个，一个是好的，一个则是危险的。

ISA的委大成就已经超越了欧洲和美国，这起始于东欧被纳入成为一部份的时候。在New Delhi，亚洲很有说服力。在墨

西哥，活跃的拉美社会学受到重受识。在Brisbane和现在的横滨市，我们看到的亚太地区的活力，而非洲社会学则在Durban展现了创意。全世界都加入了，只有中国还没有。中国的社会学相当有成就，且变动很快。不过中国社会学家在这次横滨大会很踊跃的参与。

我希望我会变成国际且跨国的。科学无祖国，而社会学不应该有国家界线。对我来说，像是波兰社会学、法国社会学、巴西社会学等等只有行政上的意义，没有真实的意思。我认为社会学只有一个。(1)

社会学群体的全球扩张有两个意义。第一，我们的研究已经身化了，提供了对于生活方式、期待、疏离、等的洞见。第二，社会学对于贫穷、压迫、歧视、排他等等的情感和伦理敏感度提升了。即使以形式逻辑的角度而论，价值判断并非遵从事实，但是社会学来说却是没错的。坚实被纪录下的事实让道德感情被启动了，然后抗拒并且转换价值。我称之为社会学的三段论，而非逻辑式的。(2) 这两者的ISA延伸都该被鼓励。

到目前为止还不错。可是另外的现象持续着：新的界线意味着社会学社群仍然分裂。我第一个世界大会上，其分列是地理政治的，社会学家来自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俄国等国，会被视为贫穷的。因为这些人政府派出来的代表，避免公开讨论，发表小众题目的论文，而非加入政治敏感的议题讨论。（我第一次在Varna的论文是论“社会学的目的论语言”。）

在80年代晚期，地理政治的高强倒塌了，新的界线则产生。第一，这些都是奠基在全球阶级分化之上的，社会学家从贫穷南方对抗富裕的北方，有这强烈的反美和反欧的性格。然后，认同分裂也产生，文化而非地理政治或是阶级政治变得重要。有些是性

别，新的民族主义聚焦在文化上，批判英语的语言帝国主义。

虽然他们可能有危险，但是这些界线反应的分裂。社会学群体是实际社会的缩影。而其一想要超越科学以外的紧张和冲突，这可以理解，可是不能原谅。

然而最近另外的内部争议也出现了，那是认识论的分野。比较不出声音的多数人认为社会学是在提供社会现象的机制和解释，透过系统地和方法论上可控制的方式去研究。社会学因此更像严格的科学，即使或许和人文科学很相近。若这个观点不被多数人所接受，那么世界大会不会有这么多好的研究，那么多杰出的人来自世界各地参加大会。

在认识论的另外一边代表的是一群活跃的少数人，把社会学当作革命的战场，要推动大众的运动。也有一些人敌视西方社会学，而提出模糊难懂的“本土社会学”。

社会学作为科学和社会学作为行动，社会学作为普世知识和社会学作为脉络化的经验，这些都是争议所在。我强烈支持前者。Michael Burawoy 称我是“最后的实证主义者” (3)，我很荣幸，因为我很高兴当实证主义者，而不是最后的“列宁主义者”。社会学家厉害的不是发动革命，而那些想要这么做的人最后只是在伪装自己，像是把研究生当穿上红衣服，或是把学术界当作政治场域。

社会学可以提供这个贫穷、剥削、排他的世界的最大价值就是透过扎实的研究去找出社会运作的机制与规律，若人真的想要改变不平等和不公不义的社会，第一件事情是要去了解社会。Karl Marx 之所以让人纪念是因为资本论，而不是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他研究了布尔乔亚社会的阶级机制。他的生命大多数时间是在图书馆，不是街头。

对学术价值的注重，就是追求适切的描述、好的解释、好的诠释、深层的理解，并透过理性、研究、逻辑的力量，把附加价值带进来：他提供了绝佳的空间去在社会学社群内建立共识，不论各种政治、阶级、文化

的利益有多么分化，最后科学价值可以把全部都统合起来。

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工作上面，把政治、政治人物、意识形态留给革命党人。社会学的组织不应该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场域，但应该是学术辩论的温床。我的梦想是 ISA 可以成为更学术的群体，而不是社会运动，工会，或是政党。ISA 应该是按照学术议程来组织，而不是政治结合，用论证取代口号，让思考引领行动，而不是追随行动。我希望看到 ISA 透过普世价值来整合，透过理性来组织，追求知识，超越任何分裂与利益。

像是 Antonio Gramsci 常说的，要去预测社会现象就是去让预测成真。这就是要我们把 ISA 从“政治正确”和潮流的方向拉回正轨。若借用一句名言来说，就是“全世界的是学家联合起来！”这或许更接近上一任会长的想法。没错，但是没忘了下一句：“除了意识形态枷锁之外，你没有什么好失去的，而且你有整个世界的知识去探索。” ■

来信寄给 Piotr Sztompka <ussztomp@cyf-kr.edu.pl>

注 1: Sztompka, P. (2009) “One Sociology or Many?” Pp.21-29 in Sujata Patel (ed.) *The ISA Handbook of Divers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Los Angeles: SAGE.

注 2: Sztompka, P. (2007) “Return to Values in Recent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 3/159: 247-261.

注 3: 辩论请见 *Contemporary Sociology* 40(4): 388-410.

> 数字化，学科性，恶

by Michel Wieviorka, Fondation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Paris, 法国, ISA前会长, 2006-2010



Michel Wieviorka.

我很荣幸和高兴担任 ISA 的会长，收获也很多。卸任后四年的现在，我想我可以谈谈这个组织。有三点值得提出来讨论。

首先，我们都知道 ISA 是开放给那些由于政治理由无法轻易参加的学者的，就像冷战时期的共产国家和现在由于台湾是 ISA 会员而中国没有加入等等的例子。我很高兴现在有了进展，因为这次的议程看到的有中国改革和社会变迁的专门场次，这是由中国和日本社会学会

共同组织的。

第二，若是社会学肯定文化多元的重要性，那么我们也必须这么做。这是为什么在我任期内我总是为了多语言而战。我们。是为应该要可以用除了三种官方语言以外的语言沟通，就像我们这次在日本用日本与一样！在墨西哥，1982 年的那会上我们只有两种语言，英文和法文。但是来自拉美学者和学生的压力让我们加入了第三个官方语言：西班牙语。在横滨，我想要看到更多防止我们往后退的努力，因为我看到的海报全都是英文，这一点想象力也没有。例如，你看到在开幕场次的字幕全都是英文，为什么不是法文？这场也没有同步翻译。当然这会花钱，但是经费问题不能用来解释为什么我们连讨论这个议题的机会都没有。若我们只用英文思考和阅读，若我们只选出从西方来的会长，我们要怎么称之为 ISA 呢？

而社会学的西方化有也危险。这是一种西方或是美国霸权的种族中心主义。是啊，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普世主义。我们须讨论普世价值，那是为了调整，而不是会了复制另外一个种族中心的西方秩序给社会科学社群。

第三，ISA 是个提供知识支持和生产的组织。没错，我们喜欢 ISA 成为科学知识的空间，有很多研究委员会，但是我们也需要制度去发展我的个体和集体的活动。社会研究不能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利益。研究必须来自研究者的好奇心，必须要承担风险，也要鼓励前瞻性的研究。我不是要反对那些有用的研究成果应用，但是我长期以来都在做 Michael Burawoy 所说的公共社会学，我认为知识不能只在象牙塔里面。但是若我们将要生产和传播知识的话，我们必须要有反身和批判的自由，这种自由需要制度的支持。以下我要提

出三点社会学所面临的挑战。

> 数字时代的挑战

我们进入了快速变迁的时代，网络是关键。新的科技和巨量资料也有重要地位。社会学也进入新的时代，我们的思考模式、研究对象、方法、典范、工具等等。这些代表了新的机会。我们要去用不同的方式工作，和其他像是艺术、人文、生命科学等的领域合作。写作和发表也在改变了，发表的模式也激烈被讨论，像是开方使用期刊等等的议题。图书馆也仍然很重要，但是角色不同了。我们会被知识生产所挑战，也被其他行动者挑战，他们有能力去动员大量的知识、经济、实际的资源。新的不平等也会产生，例如那些拥有巨量数据的人或资金去使用复杂程序的人，一定拥有更多权力和资源。在最后的20年，我们越来越使用“全球”这个字，我们也进入了非常不同的全球化年代：数字化时代。

> 学科高度分化的危险

世界上可研究的对象增加了。年轻学者又有比较好的训练，并且比上一代好很多。而且他们也更面向世界，参与网络，有更充实的全球人生，这是30-40年前所没有的。但是他们却更加专门化，通常只是在很狭小的问题上很专精，而特殊方法的发展也让有些社会学家并没有加入政治或历史问题的辩论。这带来的挑战：我们如何对抗分化或是过度的分工呢？我们怎么从特殊的领域移动到更全面的社会学关怀呢？这很重要，我们必须结合特殊的兴趣，并且加入辩论，不论是在全球、区域、国家、地方的层次都是如此。话剧话说，我们应该同时是社会学家也是知识分子。我们不应该接受高度分工的模式，这也是为什么ISA的世界大会很重要。我们有全球的社群，也不论我们的国家或制度的不同而阻碍了知识的交流。的确，在过去有很多辩论是意识形态而非科学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特殊的利益而停止知识交流。

相关地，当我们偏好多学科多元性时，我

们也知道大学和学术系统并没有帮到什么忙。社会学家必须是这股孤立潮流的先锋，挑战学科分界，以及学者者因此而有的学术生涯分工。

> 面对恶

我试着成为乐观主义者，相信社会运动和冲突会产生新的社会关系，或是转变制度。可是有些我住过或是到过得地方，我认为危机比冲突或是运动还要强大。这就是所谓的反运动：暴力、民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基本教义、反犹主义等等，这些都在成长中。社会运动的理论应该也要可以解释反运动。我是Alain Touraine的学生，我总是跟随他的方式。我应该把恶视为我们的一部分。是的，研究社会运动和反运动是社会学的优先主题。我们必须加入个人的主体性和集体行动的逻辑，并考虑主替化的过程，以及去主体化。



来信寄给 Michel Wieviorka <wiev@msh-paris.fr>

> 廉价蕃茄的背后

南意大利的移工

by Mimmo Perrotta, University of Bergamo, 意大利



意大利蕃茄采收的移工。Tiziano Doria摄影。

在 2013 年 9 月，法国国家电视台 France 2 报导了在意大利南部 Puglia 的移工故事。报导名称叫做 *Les récoltes de la honte* (令人羞愧的收割)，其描述了青花菜和蕃茄的收割，并在 Puglia 贩卖给法国超级市场，像是 Auchan, Carrefour, Leclerc 等，提醒了法国消费者：那些食物很便宜是因为那些工人的工资很廉价。

其他欧洲媒体也注意到了类似的议题。在挪威，有个抗议活动去抗议 Puglia 的剥削，也让挪威工会和连锁超级市场要求意大利工会要提出农业劳动的“道德标准”。英国杂志 The

Ecologist 也报导了两个有趣的调查。第一，在 2011 年 8 月，*pelati* (剥皮的罐头番茄) 的供给链是这样运作的：番茄首先会在 Basilicata 被收成，由非洲的移工用人工的方式采收。而负责的公司是 Conserve Italia 和 La Doria，最后会被英国的超市所出售 (Sainsbury's, Waitrose, Tesco, Morrison's)。第二，在 2012 年 2 月，他们分析了在 Rosarno 的 Calabria 柑橘采收，并要求 Coca-Cola 公司及其品牌 Fanta Orange 公布付给 Calabria 的价格。

按照这些媒体的报到，意大利南部的农业是低廉工资的产业，并且多数是移工，并且居

>>

住环境很不后，像是贫民窟一样，也有很多非法劳工，使用农业劳动合约 (caporali)，而且受到来自市场和供给炼压低价格的压力，那些劳工的工作和居住条件很不好，这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移工正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条件，并且欧洲农业也快变成“加州模式”：密集农业，剥削移工。

自从 1970 年，意大利南部变成了移民的首选。在农业人口中，大约有 110,000 的移工。而很多人都是非正式的劳工，来自突尼西亚和摩洛哥（西西里岛或是 Campania 的农业）、印度（畜牧业居多）、非洲、东欧等。

在 Puglia 和 Basilicata 地区，我们从事了田野调查，并选在蕃茄采收的旺季：六月和十月。而蕃茄会到 Campania 的罐头工厂，然后变成 pelati，这是意大利最有名和出口最多的产品。每年夏天，约有 13,000 到 20,000 的移工，多数来自非洲、中欧、东欧，他们会来找工作。许多从非洲冒着生命危险而来的人，穿过沙漠和地中海，并且到了这里，在冬天采柑橘，春天采草莓。其他的非洲工人有居住证，是因为在北方工作了很多年，可是在经济危机时被解雇，现在到南部来找工作。

东欧人总是有永久居留权。罗马尼亚人是最大宗。在旺季时，劳动需求大，许多人就会到南部去找工作，他们可能从欧洲其他国家来，从家乡来，然后采收完之后又回家。在采收季节的时候这些移工会住在乡村的贫民窟中。除了有时候的人道救济之外，他们没什么和工会或是其他组织互动的机会，因为季节一结束，他们就搬到其他地方了。

移工的雇用和居住都是由 caporali 负责，这是一个非正式的劳动合约厂商，这些人都是和其签约的劳工大多视同一个国家的人，但是是为了确保劳动力的供给顺畅。而 caporali 提供给工人之外，还提供给雇主服务。他们主要有暂时的住宿，交通，铁路站，还有超市的接送，另外还有食物、水、信用等等。

更重要的是，caporali 会监工，而雇主主要付钱给 caporali 而不是直接给工人。每 300 克的一袋蕃茄可以收到 3.5-6 欧元，但是付给工人的工资要去掉中介费，还有交通成本、房子、食物、水、等等的成本。而一位工人最多一天可以赚到 80-100 欧元 / 天。最少的则只有 20 欧元。

Caporali 的权力和利润来自工作的隔离和竞争者的缺乏，不像其他意大利和欧洲的地方会有政府介入，包括劳动额分配，公共工作或是正式的私人中介（合作社、暂时的雇用公司等），这里都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当经济危机发生时，这些工人很难向其他地方的工人一样可以联合起来一起要求权利。

工人有不同的策略去解决不好的工作环境、控制、低工资等问题，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最有利的资源就是他们的移动性，因为他们可以自由在欧洲里面进出，可以来来回回东欧和意大利，而那些地方的开销也远比西欧低，所以可以到其他地方去找工作。相反地，欧洲移工的地维比较不稳定，挑战也多，包括工作场所的冲突、族群冲突（像是 Calabria 的 Rosarno revolt, 2010 年 1 月），或是工会冲突（2010 年在 Puglia 的 Nardò 移工罢工）。

2014 年所有的这些冲突，加上欧洲的媒体，NGO，激进网络和倡议团体等等的注意下，让 Puglia 和 Basilicata 的政府保证让移工可以有好的居住地，鼓励公司要透过工作中心去用劳工，并设立了新的伦理守则。在 2014 年的采收季节，这些措施都没用，因为再次地，那些农人宁愿透过 caporali 去雇用移工，没有受到那些新政策的保护，而劳工也怕因此失去工作和居住地。■

来信寄给 Domenico Perrotta <domenico.perrotta@unibg.it>

> 罢工反对合作社

移工带头

by Devi Sacchetto, University of Padova, 意大利



反对合作社和犯罪污名化移工的Bossi Fin Law

意大利罢工委员会负责管控工作权，保障消费者免于受到罢工而引起的公共服务的损失，包括交通，健康，急难救助等等。2013年在多起罢工之后，委员会宣布牛奶之基本民生必需品，结果，某些品牌的牛奶的运送的中断就被认为是基本必需品的中断，也没有考虑到其实很多品牌都还有供应。当有被合作第三方 Granarolo Logistics 和总部位于 Bologna 的食品公司所雇用的数百名移工出来罢工时，委员会基于上述原因否决了他们的罢工行动。可是明明在超市中还

有很多牛奶品牌在架上。牛奶或许是必需品，可是要说意大利不能没有 Granarolo 这个牌子的牛奶，那一点也说不通。

意大利的合作社是在 19 世纪晚期以自我保护的型态出现的，由劳工组织，希望可以避免剥削等行为。在 1920 以前，合作社系统稳固地建立起来，这在北部和中部意大利特别如此。即使法西斯政权也不敢摧毁这个制度。可是这几十年来，合作社赚很多钱，而且他们的参与到其他领域去为第三方服务。合作社渐渐成为是大公司的帮手。

在这个转变之下，合作社的劳动条件已经变差了，对于社内和社外的劳工都是如此。此外，合作民主和参与也受到侵蚀了。劳动力的族群隔离就是导致合作社团结失败的重要因素。2011 年有 43,000 个意大利合作社 (1.3 百万人口)，这是大约 7.2% 的 GDP。合作社很重要，在物流业、零售业、营建、服务业都是。每年的产值大概 1400 亿欧元，或是 7% 的 GDP。在物流业中，大概四分之一的劳动力是由合作社雇用。而这就像是国内或是跨国企业的第三方。有些合作社甚至是有全核准

暂时劳动力的。

许多公司把生产线都外包给合作社，为的是降低成本和提高竞争力。而合作社则有更少的空间可以帮忙保障平等权利，这对社内员工都这样了，何况社外。在北部大的地区，地方的公共制度、合作社、工会等都很紧密连结，采取了类似但是不重迭的政治位置去确保“社会和谐”，并且支持地方的工业利益。天主要和前共产的合作社现在都合流了，“L’alleanza delle cooperative italiane”（意大利合作社联盟）包括了超过 90% 的意大利合作社。他们都强调效率。Legacoop 是前共产的联盟机构，拥有最大的临时派遣人力公司 Obiettivo Lavoro。

Granarolo Logistics 的合作社劳工抗议活动只是一连串的其中之一。这影响了 2011 到 2014 年北部意大利的供给和通讯。许多从北非来的移工在过去 10 年来增加很多，并且受雇于合作社。有些案例中，罢工的移工会被开除，他们会有失去居留意大利的危险，于是就会变成非法移民。

第一个重要的抗议是在 Piacenza，这距离 Milan 不远。这发生在 2011 年夏天，移工和工人要求工资调涨，抱怨工作权益的付诸阙如。而意大利的官方工会让罢工结散。不过，罢工胜利了。

劳工为了要去得到国家的工作契约，调涨工资，假期、生病给付等等，让资方成功让步。

最重要的一次发生在 2012 年，在 Piacenza 的 IKEA 工厂。合作社工人大多来自北非，要求提供工资、劳动步调减缓、保障契约等等。他们坐在地上抗议。而警察被找来解决，殴打工人，并解散罢工。几个月后，在 IKEA 的门市都有工人占领罢工，这个运动也蔓延到其他地区和交通工业中心，包括了 Piacenza, Bologna, Padua, Verona。大学生也加入，年轻工人、激进左派份子也加入。可是这个抗议的成功是因为北非移民小区之间的沟通管道奏效，并且受到阿拉伯春天革命的鼓舞。

许多移工很熟悉生产流程，因此可以极大化产量和减少损失。此外，他们和一般的工会人员和运动也一起合作。可是许多移工也要用新的方式去组织，把传统工会看做是保持现状，而允许管理阶层运作。不易外地，工人想要摆脱合作社系统，而且相信最好直接跟公司沟通。

不过，这些世界并没有带来更进一步的反省整个合作社运动的整体，而很多人运动人士日为第三方和合作社关系不大。简言之，合作社运动在意大利是很多型态

的，从目标到结果都是如此。移工是在提醒这些不同，而且 2014 年的 10 月 16 日罢工也很成功！■

来信寄给 Devi Sacchetto <devi.sacchetto@unipd.it>

> 年轻意大利人

怎么处理经济危机？

by Luisa M. Leonini, University of Milan, 意大利

Michael, 22 岁，在一间于 Milan 的知名红酒厂工作。而他是服务生，有固定任期的合约，是透过社群网络找到这份工作的。他的父亲是同一个地区的店员。虽然这个工作包括了准备前菜，Michael 觉得他正在成长中，并且使得越来越懂得知识和专业。特别是他认为他的上司教他很多基础的知识，成为侍酒师。在 Michael 的眼中，这份工作是迈向专业课程的第一步，将来可取得证照当侍酒师。总之，他很满意他的工作，让他认为他有一天可以有自己的事业。

在访谈的时候，Michael 被问及怎么理解自己成人的转变，以下是访谈：

Michael：成年意味着首先要承担责任。负责。但是每个都会说“我是成年人，我二十一岁了，我有车子。”但这不代表什么！你不知道你的人生要做什么的话，那你就不是成年人。你只

要…。我不知道怎么说…像我认为成年人就是关于工作，你工作，然后负责，也对家庭负责。跟我的朋友比较起来，我认为我比较成熟。

研究者：成熟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

Michael：就是说你就是成人了，因为我有家庭，我自己赚钱，我也照顾我姊姊的小孩，我会煮饭，我会打扫，并且工作！很少我这个年纪的人做这些都好吗。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有野心，我想要开自己的店，我会试着去做任何事情达成梦想。

Michael 就像其他的受访者，认为成年就是一种能力，可以照顾他人，接受责任，对自己和家庭负责。而这种对成年的论述是对于时下消费文化中的成年看法不同的。传统的看法认为成人就像是 Michael 描述的一样，工作、家庭、亲职等等。可是这个论述是被某个家庭位置所强化的。由于他的父

母在他妹妹出生之前离异了。他视他自己是家庭最重要可以依靠的角色。而在这个脉络里面，他很难去经验其他年轻人的生活，因为他也有了一份稳定收入的工作，所以把自己的家庭背景的负担看成是成人的一种有价值的象征资产。

比较许多朋友来说，Michael 在有相对有利的劳动力市场上，并且在经济危机中，因为他可以有能力保护自己，并且还可以梦想未来，累积经济和象征资本。

第二组受访者对成人的看法很不同。和 Michael 相反，他们把成人看作是休闲和消费场域中的自主性，拒绝存款，强调一个人必须学习怎样找到方法过一天，并在不稳定的环境和工作中生存下来。其他的论述位置多少有点不一样，因为他们也重视传统的成人观点，不过这组人比较强调“每一天都要当作最后一天”。跟之前的受访团体一样，这些年轻人的教育程度教低（多数辍

“consumption is the major
space to acquire self-worth
and recognition”

来信寄给 Luisa Leonini <luisa.leonini@unimi.it>

学)，而且他们也在比较不稳定的行业里面工作，而经济危机来时比较危险。或是他们在低技术的职业有分工作，像是建筑工，工友，服务生，搬家工人，等等，并不稳定。

虽然还是要追问下去，我们的假设是对于后者，成年是以机会来定义的。

Federico：我一天工作 10 个小时，一周 5 天。这是超时的。而且你知道吗，我一个月才 600 欧元！我看不到这个美发行业有什么希望，除非你有自己的店。好啦，就算我只有工作一年，但是我的同事，她已经 18 年了，一个月也只有 1300 欧元，你可以用这点钱生活吗？拜托！

研究者：那你怎么用这些薪水？

Federico：第一，我买车！

然后我买衣服。你看到什么就买什么，然后不要想太多啦。我辛苦赚钱就是要买东西，这是我自己赚得钱。

研究者：你打算存钱吗？

Federico：若我要存钱的话，我会用来刺青。我喜欢刺青，希望整只手臂都有图案，但你知道，这样的刺青可是很贵的，哈哈！

这组受访者认为休闲和消费更剩于投资，并且发展出一种个人主义的观点，透过这样去增加自主性。虽然这可能有点矛盾，因为低工资和不投资未来的看法会让这些人去大量消费而不存钱，但是就机会的观点来说，或许消费是主要可以让这些年轻人可以得到自我价值和认同的方式，而他们或许可以经历某种成年的独立和自主感。■

> 意大利的自由职业

by Alessandro Gandini, University of Milan, Italy, ISA专业团体委员会(RC52)



Turin自由业者的共事空间。

过去几十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已经开启了大量的媒体相关职业，被称为“创意阶级”。今天，这个劳动力市场已经变成成为企划案导向和自由业了，有时候因为没有其他方式，但是却又增加了个人的选择，因为这个工作需要专业和个人领域中找到平衡。

在 Milan，文化创意产业里面的自由职业是个教科书式的例子去说明创意劳动力。重要的是，名声的取得是很重要的。记者、顾问、沟通专家、影片制作等等，这些都在不确定和创业之间摆荡，也必须要有自我营销的历练，让这个名气经济产业可以运作，让你进入市场。这主要透过面对面的互动，有时候是数字的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远距离的互动越来越多。可是要去建立名声却要超时工作，要演练很久，压力很大，也挑战了传统对于工作和工作满意度的看法。

这个快速的自由职业扩张，在欧洲的就业市场数据里面可以很清楚看得到。自由业让许多对于独立和自我组织生活向往的人感到满意，这提供了一种传统的预算控制的理由去解释这行业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十多年前，在创意阶级的概念流通之前，有十年的时间里，政策是说要去支持个体创业和创意产业的，这不论在知识产业或是专业的企划案职业里面都是，多在城市。Milan 毫无疑问的是发展的典范。

> Milan 的自由职业

我们访问自由职业工作者，主要在都市的知识和文创产业里面，年龄在 19 到 60 岁，作为沟通、公关、媒体、设计等独立的专业工作者，这些自由工作者意味着工作是按件计酬，平均所得在 32000 欧元/年。可是，这个平均让极化的现象有了假象，

>>

其实超过半数的人薪资低于 30000 欧元。

自由工作者总是被看成是次佳选择。有受访者任职于公关顾问公司，40 岁，称自由职业实际上是一种给较少薪水的策略，而这种表面受欢迎的程度也掩盖了工作环境不平等的问题。同样的，一位二十多岁的自由记者也称 Milan 的自由职业是可以避免就又避免的。

然而，有些受访者描述自由职业可以提供了较多的自由和自我组织，这就是这个职业的好处。一位中年的女性沟通专业工作者说自由工作是把自己的时间要回来，并且在个体和职业之间有强的结合，然后可以在工作和私人生活间取得平衡。

> “名声经济”

自由工作揭示了一种“社会化”的面向，要求工作的很大一部份是要过社会关系的管理，透过说话、推荐、转介、名声。的确，一个人的个人名声在这个专业网络里面是很重要的，可以决定独立工作者的成功和生涯。而打交道的重要性意味着强调个人品牌和自我形象。

一位 48 岁的女性顾问说，她的名声是很重要的，因为若从工作辞职之后，她要“重新发明自己”。而辞职后，她建立了各种管道和关系，并且和那些有关、有名的人打交道。这个“关系性”的工作让她可以延伸这个网络到一个更大的职业供给网络上。这有些工作也直接从社交媒体来，有人从 LinkedIn 上看到她，有些是从 Twitter 来的机会。总之自由工作者的型态和传统工作很不一样。

在这些“个人简历”和“无边界”的职业中，我们看到知识产业中占了大宗。而一位自由工作者的社会网络镶嵌程度也透过谈话变成了一个人机会的试金石。在社群媒体上专业形象的建立是一种工具性的自我营销，因为数字化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 共事是答案吗？

大公司变得更少雇用创意工作者，所以自由工作者被认为是一种新的集体关系的建造和社会资本的管理。关系因此造成了个人工作机会的变动。

可是，这也增加了在家工作的数量。虽然有些受访者认为这个状况不怎么让人满意，而许多工作者想要从家庭和工作之间的规律模式中获得解脱。这里有一个新的组织方式出现了，被年轻的工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决定要去兼顾工作和个人生活的模式。

新的城市累积似乎从城市中出现，响应道友问题的自由工作环境上。最明显的就是共事空间的兴起，这提供了工作者一个分享的环境，可以一起用桌子等设施，一起交流。和其他都市地区一样的是，Milan 的共事空间很快速的成长。有不同形式的空间，有些在地，小规模，容纳广告和公共关系工作者。有些大规模，分享的不只是空间，还有工作方法。这形成了一种社群主义的关系。■

来信寄给 Alessandro Gandini <alessandro.gandini@unimi.it>

> 黎巴嫩宗派主义的快速变迁

by Rima Majed,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黎巴嫩



黎巴嫩抗议人士反对宗派主义政治，标语写着：Laïque Pride，意思同包括世俗主义和同志骄傲。

“黎巴嫩的变化太快了…昨天的敌人可以变成今天的同盟，反之亦然…Sunni 和 Shia 之间的分裂是唯一不变得事情，特别在 Rafic Hariri 的暗杀之后更是如此。可是之前你都没有这么听说过啊，我们知道都是穆斯林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对抗基督教的政治计划…现在变成是基督教变成我们的盟军，然后居然说要一起对抗 Sunni 派。”

Hasan, Shia 派战士, Amal 党。(1)

然 宗派主义总体上代表了稳固的社会和政治关系，并且从宗派的标准出发，可是在黎巴嫩，关系总是很快就变了。这个快速的转变带来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宗派主义？在黎巴嫩又意味着什么？宗派的分化又怎么那么快，特别在这个权力平衡的国家中？

前总理 Rafic Hariri 的暗杀发生在 2005 年 2 月 14 日，那是一场政治的大地震，整个重组了黎巴嫩的政治地景。史上最大的抗争发生了，并且分成两个阵营：“3 月 8 日联盟”是控诉美国、叙利亚、以色列暗杀了 Hariri；“3 月 14 日联盟”直接控诉叙利亚政府对于暗杀的支持。一开始，整个暗杀事件其实很不明朗，两个阵

>>

营都包括了彼此相互敌对的政党人士。而反叙利亚的联盟包括了许多基督教、Druze、Sunni 等的群体。另外支持叙利亚的则包括了 Shia，主要是在 Hezbollah 和 Amal 党的支持下，一年后加入了基督教党 Free Patriotic Movement。这是从 1975-1990 内战以来第一次基督教和穆斯林一起合作。

虽然目光都放在两个群体的联盟上面，分裂也发生当中，并且很快变成了 Sunni 和 Shia 的对立。2008 年 5 月，政治危机爆发，5 月 7 日，Hezbollah 战士和同盟动员要占领首都 Beirut。而暴力很快的扩散到其他地方，在 Tripoli 和 Shouf 的暴力最为严重。虽然许多派别 (Druze，基督教，Alawi 党，还有非宗派的政党像是叙利亚社会主义民族党) 已经加入这场对抗，但是还是被认为是 Sunni 和 Shia 之间的冲突。

宗派主义和政治是一体两面的。政治组织若是按照宗派主义来发展，那么政治和宗派就会交织在一起。此外，多数的政党是有清楚的宗教群体的，这让政治冲突容易演变成宗教冲突。然而，宗教的分化主要是依照反对团体的能力，规模、权力、经济、军事力量来决定的。

虽然许多对于黎巴嫩的分析都放在宗派主义，可是这些分析并没有办法解释政治和经济的因素怎么促成宗派主义。虽然所有的宗派认同都有重要性，可是只有一些在政治上是重要的。换句话说，真正重要的是黎巴嫩社会的动态，而非宗派主义本身，也不是宗派主义的政治化。

在个人的层次，宗派认同可以超越宗教团体，包括了清楚的政治和社会意含。说某个人是 Sunni 派或是 Shia 派，在黎巴嫩代表了不只是宗教，还是政治意义、社会归属、社群忠诚等等。宗派和政治认同总是可以替换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基督教认同已经在黎巴嫩政治上不再重要，因为其只有在社会上重要。而基督教社群也分裂成两个政治阵营，那就是上述的“3 月 8 日联盟”和“3 月 14 日联盟”。这个例子显示了黎巴嫩社会分歧的内容和边界是永远流动的，而认同是不断定义和重新定义的，随着政治界线改变。这个观点和把宗派视为不变和本质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

虽然 Hariri 的暗杀是个转折点，而重新组织了之前就存在的宗派关系，变迁的根源主要还是在内部社会经济的因素，此外，中东地理政治的改变和伊朗、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以色列、美国等的外部角色也很重要。而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对立被 Sunni 和 Shia 的对立所取代也是基督教没落和 Shia 兴起的原因。

Taef Agreement 把 1990 年的内战中止了，并且修宪给许更多的政治权力给 Sunni 派，而军事权力则给 Shia 派，然后透过把总统角色若化

将基督教派边缘化。社会经济原因也解释了宗派论述的重组。Shia 的社群向上流动，透过都市化和迁徙，让许多 Shia 派的人成为主要的投资者和重要经济人物。同样的，Hariri 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特别在内战后，重构了 Beirut 的阶级关系，创造出了经济精英的新阶级，让旧的阶级 (基督和 Sunni) 消失，他们主要是地主和商人。而透过 Taef Agreement 的政治权力，Sunni 和 Shia 的社群也成为最主要的竞争者。

像是其他地方一样，黎巴嫩的冲突是经济和政治的。冲突透过不同的形式出现，特别是不同的认同的形式。但是这个重迭并不代表说这个冲突是认同的冲突。承认宗派的变动本质和解析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可以让整个政治冲突更明朗，也是其他社会分裂分析的重要方法。这个方法是很必要的，特别用在阿拉伯地区的冲突和在叙利亚及伊拉克极端主义运动的理解上，格外必要。■

来信寄给 Rima Majed <rima_majed@hotmail.com>

注 1: Hassan 是假名。他在 1975-1990 参加内战，然后在 2008 年 5 月上街头，加入了暴力抗争。

> 在黎巴嫩战争地区种植“苦的作物”

by Munira Khayyat,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埃及



捆绑刚收成的烟草叶，然后晒干。这些工作主要都是小孩、女人、老人在做的。Munira Khayyat摄影

在阿拉伯世界暴力事件频频发生，特别是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中海东部地方的战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去注意到日常生活的一般事物是怎么持续展开和维系，是很难的，甚至不太可能。其中一个规律的循环就是烟草的种植，已经遍布南黎巴嫩的山上，满山遍野。几百年下来，在夏季的6、7、8月是烟草的季节。即使烽火四起，烟草的收割让这个地区得以有一丝生

生不息的象征。

被称为“苦作物”的烟草是在是在黎巴嫩南方的山丘上生长的，而拥有者是一间国有公司Régie Libanaise de Tabacs et Tombacs所垄断(Régie)。没错，烟草是一种不好、消耗劳动力、致癌、剥削的市场商品。环境和人道团体提倡在该地区应该以麝香草替代烟草栽种，或是设置用水采收烟草的方式，取代现有的农业模式。可是黎巴嫩的人不可能放弃烟草。对于他们来

说，烟草就是生命，为他们带来收入与生命保障，无可取代。烟草对于这个历经战乱与暴力的地区的人，是种苦涩的依靠。

今日的烟草农业成长很快，因为自从黎巴嫩2006年的最后的战争周期以来，尽管战争最后阶段以色列投下了数百万的炸弹到黎巴嫩南部，烟草的产量非常大。不过那年因为战乱，烟草收成少之又少，可是后来就复苏了。

烟草现在遍布南方，取代了原有的橄榄和柑

橘作物，而烟草只能被消费使用，不能吃。在这个烽火连天的地方，烟草也取代了畜牧，因为畜牧很难在这个战争区域维系下去。而南方人就越来越依赖这个有争议性的农业维生。

烟草是一种很硬的种子，必须要在酸性的高地上生长。其栽种期很短，从2月到4月，5月到8月。而在贫脊的土壤上也可以有很好的表现，因为它不需要复杂基础设施或空间，只需要一间房子，前院与后院，山坡地，不规则或不满石头的土地。人力也简单，女人、小孩、老人都可以，不过男人们都在城市中工作。这些剩余的人口就担负起这个烟草产业的责任，传承下去。

只有那些有执照的人可以种植烟草。这样的人很少。在60-70年代对于烟草的劳工运动兴起前，烟草执照被掌控在那些地主手上。今日小农得到了部份的土地，而当年发生游击战时，许多地主逃去了都市，“他们”的佃农，利用那些从非洲、拉丁美洲、澳洲等来的金钱去购买小小的一块地，当然也需要执照。许多烟草农在那边很久，历经了以色列22年的占领，以及后来的占领年代，还有2006年的战争。透过这样，他们取得执照，得以栽种烟草。

那要怎么解释烟草在黎巴嫩南部的成功呢？为

什么这些穷人这么依赖它呢？

其一是关于什么在工作以及谁在工作。黎巴嫩南部的人口和地理条件开启了种植烟草的环境，但是也不利于持续。此外，这个作物的成功是被黎巴嫩政府所结构的，因为政府给合格的种植者固定的价格合约(8-13美元/克)，这无关全球烟草价格的波动，也让政府可以获得很大的利润。

这个合约同时被种植者讨厌和喜欢。确定的收入来源同时让他们工作很辛苦。黎巴嫩政府把烟草补助视为一种对于需要人民的义务。不过政府也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关于烟草，大致有两种论述。其一是关于生命，劳动，爱。许多成功的南部人把他们的成功归因给他们的努力种植烟草，并养活整个家庭，让小孩得以受教育翻身。那些种植的人几乎都是女性，也都很骄傲可以从事这行，收割、拣选、干燥、包装等等的技巧都是相当引以为傲的。在其眼中，烟草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另外一种论述是从那些购买烟草的人来的，也就是Régie的官员。他们觉得质量参差不齐，也抱怨要从那些种植户中买过来，实在是种不可靠的商品，而且还要重新包装，储存在仓库，和全球的其他烟草公司议价，那些公

司还要求要买一定的量好获得利润，有些人说这些辛苦栽种的烟草和垃圾没两样。我们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显示了这个行业的争议所在。

不论烟草的使用和目的为何，因为可以取代之的作物相当少，所以烟草仍然还是会南部黎巴嫩的经济命脉。而边界的所谓“前线村庄”是种植苦作物的最积极的地方，因为这可以带来稳定的收入，也象征在这个战乱频仍、暴力与毁坏遍布的地方，仍有生生不息的一丝希望。■

来信寄给Munira Khayyat
<mk2275@columbia.edu>

> 转动评鉴的螺丝

高等教育的堕落

by John Holmwood,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英国, ISA执行委员, 2014-2018

许多评论者认为，够过评鉴审查 (audit) 的“新公共管理”上轨道，甚至被“公共价值”所取代（把提供给公众的价值极大化）。在英国，整件事情看起来都非常空洞，特别是对于大学来说更是如此。最近的改革已经否定了大学的公共价值，只强调其对于经济成长和人力资本的贡献，把学生看做是“消费者”。在这个脉络底下，使用评鉴审查去形塑大学，开放给市场，然后强定管理，已经变成是最重要的事情。

在英国，学术界已经开始在等今年的学术评鉴的结果了 (REF)，因为 12 月结果就要揭晓。REF 每 6 年一次，并且会决定系所的收入量（其他则包括学费和外部的资金）。这个收入的分配取决于评鉴的分数，而评鉴则是由评鉴委员会所作的审查，由其他大学所组成。分数是匿名和累计的，标准是评鉴一个单位的研究环境，以及对于外部、非学术的影响与贡献。

REF 是非常花时间的一件事情，而且也相当花钱，因为整个过程要有所管理。这个过程也被批评是会让那些“安全”的研究比较可能获得正面的评价，让那些单位有策略操作的空间，并且减少合作的关系，因为大学都要忙着管理研究和发表。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直接的巨观大学管理策略和目标以及微观个人管理之间的连结，因为评量委员会是受到官方保密法案所约束的，所以都不公开。不过事情很快就有改变了，因为负责 REF 的单位：英国高等教育资金委员会 (HEFCE) 现在正在执行 REF 的数组化。

在 2001 年被退回的计划书现在回来了，原因并不是使用文献引用数据的方法上的困难，而是数据的增加让这个计划又有了价值。

REF 的“数组化”是个“巨量资料”的计划，每个学术人缘都有出版的引用的数据，并且在线可以收集得到。此外，现在的系统非常花钱，所以私人公司像是 Thomson Reuters 可以用低廉的价格提供大量的数据。专业审查将会被根据巨量资料跑出的分析所取代，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学术自由，因为学术标准被市场逻辑所取代。的确，英国的学术界已经和 REF 一起成为这个共犯结构，而 REF 数组化让学术管理和巨量数据公司结合在一起了。

David Eastwood (Brwne Review 成员) 建议把高等教育的公共资金来源用全球市场机制来取代之，并且建议矩阵化可以更进一步使用来推动全球化。REF 的全球化透过审查评鉴会变得很可怕，花钱，有可能造成外界具有敌意的响应，Eastwood 则说英国可以从 REF 的高名声之中获利，这是大学管理阶层愿意接受的观点，而学术人则不会。国外的资金提供者和政策制定者有可能会被要求和 REF 合作，也可能受制于私人公司的游说。

这些都是在没有公共讨论的前提下发生的，在学术界没有讨论，在公共领域也没有兴趣讨论这种教育民主的问题。学术自由可能和政治的自由不同，但是政治自由必须有学术自由为基础。

REF 已经把学术研究让渡给官僚管理系统了，并且寻求资金的最大化，但是数

“Big data” now provides a “marketable moment”

组化让其变得只是一种宏观管理的工具，实际上数组管理的 REF 是用公共数据下去运作的，这代表了个人的学术人员可能会被追踪，但是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现在的系统上。任何提供服务的公司，若是提供系所排名的服务，那么也可以提供相同的服务给那些要聘用教师的系所。的确，文献引用数组是在 1970 年代早期被发展出来达到这个目的的，而现在的巨量数据提供了“市场机会”，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版本的“教育机会”。

这个宏观管理的引进对于英国大学来说是个新的潮流，叫做 Russellton。这代表了 Russell Group 的对精英大学的自我宣称。首先，这包括了一个以小时为主的工作模式，要去纪录在各种学术工作之上花了多少时间，好方便提供审查，并且包括了几个方面：目标、目的、机制。以下介绍这个复杂的架构（特别是空洞的内容也可以有那么复杂的架构）：

- 目的 2: 增加 Russellton 大学的高质量输出。
- 目标 2.1: 去达成和维持 REF 的 GPA，让其超过平均的 2.71。
- 目标 2.2: 去增加大学研究的质量，而其是用 3 年的引用影响力为衡量，到 2020 年要增加 20% (2013 年是 1.68%)。
- 目标 2.3: 要前 10% 的 3 年的出版量增加到两倍 (2013 年是 21%)。
- 目标 2.4: 增加国际合作出版 55% (2013 是 40%)。

- 目标 2.5: 增加引用数量 (2013 年是 62,413)。

• 机制 2.5: 开放使用、引用、h- 索引、文献引用矩阵必须整合到整个评鉴架构之中，让学术人缘可以增加产量与质量。所以，所以，大学评鉴的螺丝正在让学术界空洞化，变成只是“可评鉴的机会”，牺牲学术自由，让位给市场。这就是 HEFCE 想要带来的结果。■

来信寄给 John Holmwood <jholmwood@ias.edu>

> 埃及的吉普赛人

by Alexandra Parrs,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埃及



30

埃及的Dom人，存在却看不见。Arbu绘。

于许多埃及人来说，吉普赛人是埃及人这件事情是很令人惊讶的。这是中古世纪对于从东方到埃及的旅者的称呼。而也会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人在埃及通常被认为有魔法的东吉普赛人，或是 Dom 人，其实是埃及的贱民阶级。

东吉普赛人叫做 Dom。这和叙利亚、土耳其、以色列、埃及等的命名不同。可是，虽然 Dom 和 Roma 人在中东被过度的污名化，Dom 在埃及并不被官方所承认，部份原因是因为宗教是主要的承认基础。埃及的身份证会列出一个人的宗教。而通常有三种：基督宗教、伊斯兰、犹太教。到目前为止，除了这些宗教的人是没有身份证的。因为宗教被官方所规定，所以其他的身份，像是族群，就没有被采

用了。那些常用的族群名称，像是 Bedouin, Nubian, Dom 等，是民间在用的。

认同的缺乏是以统计类别为基础的，所以不太可能去推估埃及的 Dom 人口。主要的提供者是福音教派组织所提供的。他们估计大约 1 到 2 百万人，多数是穆斯林。埃及的 Dom 被分成两个次群体，这在中东的脉络下更具有意义。那些群体的名称是 Ghagar, Nawar, Halebi。这些阿拉伯文中也有不好的意义就是。福音教派组织认为 Ghagar (意思是粗野的) 可能是埃及 Dom 人口的最大宗。

因为 Doms 并不具有官方身份，政府也没有驱赶或是同化他们。在欧洲，强迫的同化和边缘化似乎是唯二的选项，因为那些游牧人口

>>

被认为是偏差的，或是有敌意的。在埃及刚好相反，因为游牧人口在历史上是整合进主流社会的，即使那些人不被接受。此外，中东的游牧人口通常被认为是 Bedouins，而非吉普赛人。

埃及政府似乎是知道吉普赛人的存在的，但是他们是一个群体吗？还是只是一种想象？Nabil Sobhi Hanna 做过民族志的田野研究，这是在 50 年前，于一个半游牧的 Ghagar 的社群之中，位于 Sett Ghiranaha 的区域，也是在 Nile Delta 地带。Ghagar 人在他的描述里面，总是居住在村落的边缘，有着很不同的职业：贩卖马或是驴子的人，铁匠，或是娱乐者。近年来，许多人已经在 Cairo、Sayida Zeinab、Sayida Zeinab 的市区建立起了社群，在那里他们是铁匠，贩卖金属者，“思考者”，卖木材者，音乐者、舞者，贩卖皮革制品者，药头等等。有时候也是乞丐。在 City of the Dead 的人是 Zabaleen 和 Orthodox Copts，多数是拾荒者。而虽然大多数人的 Dom 是迁徙的，但是他们的活动可包含了短程的移动，像是打工，租屋，也可以在同一个地区内搬家。不过他们还是处于埃及社会的边缘。

当多数的埃及人并不知道吉普赛人的存在，但是也有人知道，并且会说他们曾经在旅行的时候遇过占卜的吉普赛女性，或是娱乐者，或是小偷。虽然 Dom 并没有被完整认出来，他们似乎是存在的，至少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里面，也可以被轻易的在特定的脉络或是片段中被实体化。

吉普赛的人物形象时常在乡村出现，他们可能是其他的部落。吉普赛人被用零散的方式所认识，像是对于埃及音乐的贡献，或是透过 Ghawazee，Nawar 部落的肚皮舞等等。Ghwasee 是 Harem 的舞者，19 世纪在 Cairo 被禁止，后来被 50 年代的电影所浪漫化。Tamr Hindi 的有钱年轻男性和 Ghawazee 相恋，然后想要受到对方的尊敬。不过后来失败了，于是 Ghawazee 人留下来，从此两边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

吉普赛也在 Moulids 的时候成为娱乐者。部份是朝圣，部份是狂欢，部份是伊斯兰教的庆典。在埃及，Moulids 是不受县至于先知的生日的 (Moulids en Nabi)。但是可以指向在地 Sufi 圣人的庆祝，这总是吸引埃及政府的注意，因为 Moulids 是被 Shia 和 Sufi 派的政府所认可，而不是 Sunni 政权。可是 Sunni 是埃及的大宗。尽管官方的否定，Moulids 很广泛得出末。他们很像基督教狂欢的无政治府时代，一般的规则的都可打破。性别隔离不存在了，性禁忌也被遗忘了，跳舞很被鼓励。Doms 则是 Moulids 的一部分，这不让人惊讶，因为一旦你了解他们娱乐和非道德的艺术之间的关系之后，就可以理解了。女人跳舞，男人玩音乐。Dom 的女

性从事一般女性不会做的事情，或是介于两性之间的事情，他们是 Simmel 笔下的陌生人。

所以，在埃及，吉普赛人是谁？他们不被官方认同，是被人为是在乡村的游牧民族和贩卖马的人，或者是在城市娱乐者，Moulids 舞者，或是 Ghawazee，占卜者，乞丐。总之，他们主要是穷人，被边缘化，或是被忽略。这就像是 Edward Said 所说的东方主义，也就是在欧洲意义下的东方人，吉普赛人是“他者”，也备件构成具有外国情调的他者。讽刺的是，埃及的吉普赛人也被“东方化”了，他们的特征很像那些东方人，或是在欧洲的吉普赛人。他们象征危险、惊奇、吸引的阿拉伯男性（危险的有趣）或是女性（性的 Harem）。男性被认为不可信任的窃贼，女性被看成谜样的危险，像是肚皮舞者，或是占卜者，或是 Ghawazee 妓女。

对于在埃及 Dom 的研究是特别有趣的，因为有关于他们经验的问题被提起了：这些跨国的吉普赛人是如何实做边界和民族国家的？这些实做和认同怎么样被建构起来和运行？Dom 和 Roma 是永远的贱民阶级吗？他们会是国族认同的永恒威胁吗？而像是埃及这样的国家怎么处理这一不论有宗教信仰或是没有宗教信仰的这群人呢？■

来信寄给 Alexandra Parrs <aparrs@aucegypt.edu>

> 法国被怀疑的跨国恋人

by Manuela Salcedo,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HESS), Paris, 法国, Laura Odasso,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比利时, ISA Research Committee on Biography and Society (RC38) 会员



“这太夸张了！法国政府给摩洛哥政府命令要避免犯罪，可是像我们这样的情侣却要因为法国很不一样的法律而付出代价 [...] 而你们应该感到羞耻。” (1)

利亚等，面对了更多的限制，这是因为他们在法国已经不是少数了。而对于穆斯林侵入的恐惧，以及阿拉伯和穆斯林这种混合的想象，这些都影响着伴侣的权益。

很吊诡的是，法律却也影响法国那些和外国居留人士成为伴侣的本土法国人的权益。这个污名化过程也影响了外国居留人士或是欧盟的另外一半，变成了其“陌生人”，因为会被认为他们选择了外国伴侣而有国家认同的问题。

“这太夸张了！法国政府给摩洛哥政府命令要避免犯罪，可是像我们这样的情侣却要因为法国很不一样的法律而付出代价 [...] 而你们应该感到羞耻。” (1)

> 限制移民

在法国，在法律和实际之间有着很大的矛盾。限制家庭移民已经是自从 2003 年以来的首要立法任务。而有 5 项法律让跨国恋人产生很大的困扰。2006 年的两项法律：

“Sarkozy II” 和 “Clément’s law” 是为了要辨识假婚姻移民而设立的：

婚姻已经在过去 5 年有很大的变化，成为了主要的移民方式。而被政府破获的假婚姻移民案例却没有减少。(P. Clement, National Assembly Speech, 22.03.2006)

民事的官员被要求要一起审查伴侣，或是有必要的話，要隔离审查。官员若是怀疑婚

在 过去 10 年来，外国居留人士 (Third Country National; TCN) 或是欧盟的跨国情侣的权益受到和大的侵蚀。他们不是公民，而是居民，被赋予限缩的法律权益。在法国，政府使用法律管理的手段去介入跨国情侣的亲密关系。这包括同性恋和异性恋。此外，法国政府也似乎更保护本国的家庭和情侣。

透过访谈这些跨国情侣，在多重地方进行，包括了参与观察那些跨国家庭和移民的权利组织，例如 Public Ban on Lovers 和 Association for the Recognition of Homosexual and Transgender Rights for Immi-

grants and Residents，我们研究法律改革，政治脉络，以及官员的态度等等，会怎么影响跨国伴侣。

在法国，移民法律区分被选择的移民 (高度被认可或是需要的移民) 和非选择的移民 (家庭依亲或是政治庇护)。移民若是为了加入伴侣或是家庭的，是被归类成非选择的移民，尽管家庭移民是被宪法和国际法惯例所保护。公共论述中，家庭移民包括了民族家长主义和边界的建构。实际上，外国居留人士所受到的对待是取决于他们的国籍、地区、性别、性倾向。从后殖民国家来的移民，像是摩洛哥、阿尔及

姻，可以有权力不让其婚姻合法，并起诉之。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任何的伴侣若是缺少的法国的居住证明的话，就要提供进一步信息。而即使结婚以后也要接受审查，要提供账单的信息去证明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真实性。

2009年之前，政治论述把跨国婚姻描述成“移民的首要来源”，让人觉得新的婚姻类别，像是同志婚姻等，是恐惧的，也被认为是有可能作假。这和所谓的“白色婚姻”，有很大的不一样。在后者，婚姻一方完全知道另外一半的企图，是可以欺骗政府的。2004年有278,600个婚姻，其中5,272被民事注册官员所处理(1.9%)，而其中的737个案例是无效的，包括了444个是假结婚。(2)最后却只有4个人被法律认定确定是假结婚。

为了得到公民资格，法律规定外国居留人士必须归化到法国社会里面(语言测验、法国公民的权利义务测验等等)。婚姻本身并无法直接让你取得法国籍。而这个过程已经从1984年的6个月被延长到现在的4年。

➤ 管理跨国婚姻

官员为了控制移民，已经用了许许多多的方式。(3)核发签证、工作权的单位必须要去保或国家安全，则通常有着非法律的对于移民的理解。官员是在整个管理体制的最下方，直接面对案例，且其权力取决于他们对于各种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法律上，是Prefect单位要去决定外国的人居留问题。可是实际上，跨国伴侣常常会面对这些在第一县面对移民

的官员，这些官员则把这个职位看成是肮脏的位置。“肮脏性”就是从其工作经验而来的描述，包括了在工作场所的“气味和声音(外国语言)”，这被用来对比干净和安静的管理阶级办公环境。而这些官员的个人态度也会影响到那些伴侣，因为伴侣要和这些其实没有实际权力的官员打交道。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那些其实根本没看过移民的人的手中。

➤ 面对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

和跨国家庭有关的移民政策有许多种的歧视。被警察歧视、被政府官员歧视，这些都会发生在法国籍另一半的身上。而处理移民事务的第一线官员也会造受到这样的对待，这是Goffman所说的污名，是会延伸到这些官员上面的。年龄、收入、外貌等都会让人去判断一对情侣的真爱与否，可是却不会影响到那些已经存在的污名。

跨国恋人的私人领域因此被公开了，当这些人在其他人面前讲述自己的关系、感觉、爱情、问题时，都是要去证明自己的真正情感。有趣的是，法国政府和跨国恋人之间所认为的婚姻定义却相去不远。对他们来说，爱是婚姻的前提。制度的种族主义或是政府的排外主义侵蚀了公私的划分，也入侵到了家庭生活里面。■

来信寄给 Laura Odasso <laodasso@gmail.com> 和 Manuela Salcedo <manuesalcedo@gmail.com>

注 1：Notes from Laura Odas-

so's fieldwork journal, December 10, 2009.

注 2：Belmokhtar, Z. (2006) "Les annulations de mariage en 2004." Infostat justice 90: 1-4.

注 3：Spire, A. (2008) Accueillir ou reconduire, enquête sur les guichets de l'immigration. Paris: Raisons d'agir.

> 徘徊在土耳其的幽灵

by Aylin Topal,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Ankara, 土耳其



| Gezi抗争是Erdoğan总统挥之不去的幽灵。

去 2年来，土耳其的社会和政治发展已经对于国家政体开启了新的辩论，包括了什么是这个政体的本质，什么造成了2013年6月的抗争，以其后果为何？（1）

土耳其的新自由主义可以追溯到1980年1月24日，那时土耳其的结构调整计划开始，而9月12日土耳其的军队政变发生。军队掌权，设立了2个目标。第一，是要整肃左派和工会；第二是要继续经济重建计划，保持上层阶级、西方资本、Bretton Woods制度的利益。后军队政府时代可说是新右派当道的年代。

而后的20年，也就是2002年，法律和发展党(JDP)赢得了国会多数，这是50年来的第一次。市场给予了这个胜利很好的回应，正如Merrill Lynch所指出的，“单一政党的政府会让土耳其的经济变好”。的确，在其执政之后，宣布要终结经济危机，让政府介入降到最低，并进行企业私

有化，这仍然是JDP的主要财经政策。

2013年的5月，总理Tayyip Erdoğan宣布了Taksim Square重新发展的计划，其位于Istanbul的中央，也是政治抗争的中心所在。而旁边的Gezi Park则是少有的绿地。重发展计划包括了在Taksim Square的清真寺重建。以其在Gezi Park的军营历史建筑。现在则还包括了购物广场。总理也宣布其他发展计划，包括机场，以其一座跨越Bosphorus的大桥。

就像其他JDP通过的法案一样，这些计划并没有经过国会充分讨论，更不用说公民社会的同意了。土耳其工程和建筑工会和都市规划委员会立即表示了反对意见，其他的运动者团体也加入，声明要停止那些建造案。5月28日，这些人开始去扎营抗议。

5月31日清晨，警察使用暴力攻击抗议者，并且焚烧了帐篷和其他的武力，像是催泪瓦斯，要铲除那些他们口中的“极

>>

端分子”。

在当天晚上，反对团体和其他 Istanbul 的协助，号召到了上百万群众，冲到公园里面，抗议警察的暴力驱离，并唱“Everywhere Taksim, everywhere resistance,”

“Dictator resign!” 和 “Jump! Jump! Whoever does not jump is Tayyip!”

这样的反应并不令人讶异。而另一方面紧张与不满仍然逐渐升高。2012 年 12 月 18 日，当 Erdoğan 到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METU) 看军事卫星的发射时，警察暴力的驱离抗议学生。虽然总统说愿意调查，可是他却批评教授可耻，要他们好好教那些学生怎么尊重别人。接下来各大学的抗议都被镇压。4 月时，Emek 戏院被拆，因为要设置娱乐和购物区，这引起了更大的抗争。而和平的抗争又被警察所暴力镇压。政府的威权心态和保守主义变得越来越明显，在 5 月更进一步限制贩卖酒。这个政策是 Tayyip Erdoğan 宣称用来保护青少年和宗教律法的。同时，有一对情侣接吻而被取缔。所以接下来的抗议者就到同一个地方去集体接吻。

总理对于 Gezi 抗争的响应是说有上千人抗议，没问题，可是我可以带上百万人去对付你们。所以巴士把他的支持者带到了 Gezi Park，并高喊“把 Taksim 拿下！”和“少数的人们，不要试探我们的耐心！”

Gezi 的抗议是在质问政府的正当行，并挑战 JDP 的统治。可是，这个抗争其实瘫痪整个政府，把保守的政府的独裁真面目揭露了。从 2013 年 7 月开始，政府开始起诉抗议者，说抗议是在破坏这个国家的文明。

在许多对于总理、家庭、阁员的贪污的指控被放到网络上之后，Erdoğan 开始对付 Gülen Brotherhood。有个影像纪录显示了总理要其儿子存入大量的现金。而 Erdoğan 则说这是对抗政府和接下来选举的阴谋与政变。JDP 政府接下来控制了议会，并且通过新的法案，让国安情报单位

可以不受限制地审查人民的出版与言论。可是，8 月 9 日，Erdoğan 得到了 51.8% 的得票当选总统，投票率则有 73.4%。在这场选举中，Erdoğan 不断说自己是有经验的总统，不会像前任一样。他似乎要掌控一切的权力。而法律上的议会制和实质上的总统制不是责任政治，也是对于独裁的绝佳掩护。

面对这个政体改变的时刻，土耳其政府在 JDP 主导下，其实正在流失其正当性。这也就是盘旋在政府和总理上的幽灵。■

注 1：需要来源的话请写信给作者。

来信寄给 Aylin Topal <taylin@metu.edu.tr>

> 哈萨克的舆论操作

by Almas Taizhanov, 哈萨克社会学会, ISA会员



Gaukhar Monko是乌克兰裔的哈萨克人
Sergei Monko的哈萨克妻子，说：“不要战争”，其眼泪是乌克兰国旗的颜色。

哈萨克的乌克兰和俄国比邻，也有着前苏联的相同地位。但是有一点必须提出来的，两着有着相同的悲剧：两国都都在苏联集体化时代(1932-1933)有大量人民死于饥荒。根据统计，这个数字在1934年是1,840,000名哈萨克人，大约是1930年代总人口47.3%。几乎一半的人口死亡，这个空缺由第二次大战后的大量苏联移民所填补了起来，这也重塑的哈萨克的人口结构，根据1959的人口统计，哈萨克人只有30%，但是1926年有58%。

乌克兰的饥荒也夺走了3百万条性命。这个数字远比哈萨克小。1926年的哈萨克有2千3百万人。此外，在乌克兰，政府征收谷物，但在哈萨克，人民失去牲口，这也是主要营养来源。乌克兰人可以从饥荒中存活的机率大一些。

而苏联大量移民人口的影响就是两国的人口都有大量的俄国人。这在北哈萨克和东乌克兰特别如此(Donetsk和Lugansk)。我们在今日可以看到发生许多冲突。

没有社会学家研究过哈萨克的独立运动，特别是在北方的区域。然而，1999年11月，一群武装独立运动者闯进Ust-Kamenogorsk城市，这在两国边界。他们是由22个俄国人所组成的团体，11人是苏联的公民。这个事件被哈萨克的国安局所封锁住，所由人被处以6到8年的刑期，期满后放回俄国。

尽管这段历史的存在，哈萨克对于独立运动并不是非常关注。而且，根据一份由哈萨克社会与

>>

政治研究中心 Strategy 所作的调查，在乌克兰边界冲突后，61% 的哈萨克人支持苏联兼并 Crimea，23% 没意见，只有 6% 的人说这是非法行动，侵犯乌克兰的领土。这个调查显示了媒体掌权者和（哈萨克、俄国、西方）人民态度之间的关系。

根据 2011-2015 的哈萨克信息和通讯部的发展计划，有 2740 哈萨克的媒体组织（平面、电视、广播、电子等等），其中 20% 是用哈萨克语播报，34% 是俄语。其他是两种都用，但偏向俄语。而网络上的哈萨克语网站远少于俄语，所以在哈萨克网络几乎是俄语的天下。此外，俄语电视频道是免费的，俄国报纸和杂志和哈萨克也相当普及。

更据上述调查，受访者的信息来源是：哈萨克媒体（50%），俄国媒体（31%）。其他包括了网络和社群网站像是脸书（9%），以及朋友、同事、亲人（7%）。西方媒体来源只占了 1%。

这样的信息来源怎么影响公众意见呢？在那

些接受哈萨克报媒体的人中，54% 赞成俄国的兼并行动，20% 反对，26% 不知道。可是，那些接受俄国媒体信息的人中，84% 赞成，只有 4% 反对。而那些接收西方媒体的人有 31% 赞成，39% 反对，31% 不知道。这是个很令人惊讶的结果，特别是那些期望收看西方媒体的人会特别反对俄国行动的人来说。这是令人惊讶的。那些长期上网的人里面，48% 支持俄国，35% 不知道，17% 反对。如前所述，哈萨克的网络是很“俄国的”。

在乌克兰和俄国的冲突期间，政治宣传到达了前所未有的境界。电视和平面媒体让整个事件更加让政治宣传有效。两国的政治宣传也影响着哈萨克人。同时，哈萨克的媒体却没有宣传什么。结果就是哈萨克的民意被俄国媒体所控制着，而且也制造了意识形态对立，像是爱国者、自由派、崇洋派以及俄国派两边。社会科学研究的缺席让事情更糟，这也让哈萨克的未来更加堪虑。■

> 地球的未来

by Emma Porio,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菲律宾, 前ISA执行委员, 2006-2014, 现任ISA 的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ICSU)代表

国际科学委员会 (ICSU) 在 Auckland Convention Center 举办年会，讨论国际科学和未来发展。第 31 届的主题是“全球变迁的 30 年来庆祝”。聚焦在科学的开放使用和警告科学的误用。

ICSU 于 1931 年成立，是非政府的组织，在全球各地都有会员 (120 的成员代表了 140 个国家)，也包括了国际科学组织 (31 个成员)。ICSU 的活动聚焦在 3 个领域：规划协调国际研究、科学政策、科学普遍性的提升。这是政府和联合国组织的顾问团体，也是全球知识社群的代言人。议题包括环境和科学行为。

纽西兰的总理 John Key 主持了开幕的会议，强调了该国的特别环境挑战和对于国际研究的贡献。Peter Gluckman 是首席科学顾问，也是纽西兰皇家科学院院长，给了主题演讲：“科学的变迁本质：科学家可以面对挑战吗？”他警告的听众，说科学系统变化得非常快，若我们不好好便对这些挑战，那会失去公众的信任。

为期 5 天 (8 月 31 日到 9 月 4 日) 的会议，ICSU 审查了其重要计划的过去 30 年进展，包括：

- 气候变迁的跨政府计划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 国际地理生物计划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
- 世界气候变迁计划 (World Climate Research Program)
- 生物多样性科学 (Diversitas; Biodiversity Science)
- 国际人类计划 (International Human Di-

mensions Program)

- 地球科学计划 (Earth Science Program)

这些是 ICSU 未来计划 Future Earth: Research for Global Sustainability 的基础计划。.

ICSU 和其他两个学术机构合作，试图去建立一批新的科学家：Global Young Academy (GYA) 和 World Academy of Scientists (TWAS)。从 1990 年开始，在 Berlin 有德国科学院的支持，GYA 有了 90 的科学家的规模，遍布全球，举办工作坊和会议去分享研究成果。TWAS 是全球科学的组织，有包括 50 经济体的科学家社群。在位于意大利的 Trieste，TWAS 试图要“增进创新永续发展，并透过研究、教育、政策、外交等方式达成。”

在 2010 年时，ICSU 邀请了 ISA 去整合社会科学，但是这样的努力还要持续。现在，ISA 正在重新考是否值得继续和这群硬科学的人一起合作。从 2010 到 2014 年，ISA 的执行委员和 ICSU 的拉美地区执行长 Alice Abreu (2006-2010) 是 ISA 的 ICSI 代表。同时，Stewart Lockie (前 ISA 的 RC23 的环境社会学委员会会长) 会是 ICSU 在策略规划和研究委员会的成员 (2013-2014)。■

来信寄给 <eporio@ateneo.edu>

> 罗马尼亚团队

by Ileana Cinziana Surdu,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罗马尼亚

我们这个团队自从 GD3.1 期开始加入 (2012 年 11 月),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的团队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是好事, 因为我们从不同的成员身上学到了很多翻译和编辑的技巧。我们都是社会学家, 多数是博士生, 都相当有热情与活力。全球对话让我们的团队有了很好的机会去探索全球社会的各种议题。

我们的团队有 6 为常态成员, 以下我们介绍了这些成员和至少加入过编辑 5 期的人。除此之外, 有其他 11 人都曾家参加过编辑至少 1 期, 他们是: Ramona Cantaragiu, Cristian Constantin Vereș, Angelica Helena Marinescu, Monica Nădrag, Ioana Cărtărescu, Mădălin Rapan, Andreea Acasandre, Daniela Gaba, Alexandru Duțu, Gabriela Ivan, Levente Szeked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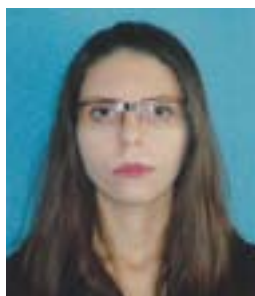
Cosima Rughini 博士是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社会系的教授, 也是 Compaso 期刊的主编, 是一本比较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期刊。她教方法论, 研究兴趣是量化方法, 问卷的修辞, 以及透过游戏和数字媒体的科学沟通方式。来信请寄到 cosima.rughinis@sas.unibuc.ro



Ileana Cinziana Surdu 是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的博士生。她曾是方法论和市场与工作的助教, 也参与社会整合和发展等研究计划。其兴趣包括了时间社会学工作生活平衡、家庭与传统、非语言沟通。来信请寄到: ileana.cinziana.surdu@gmail.com



Adriana Bondor 是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的博士候选人。兴趣在罗马尼亚的社会学史。专业包括了各个领域: 社会史、社会学史、文化与记忆、罗马尼亚与欧洲的共产主义。她希望未来从事文化社会学。来信请寄到: adrianabondor@yahoo.com



Alina Costiana Stan 正在两所学校工读联合博士: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和 Lille 2 University (法国)。她的兴趣包括工作暴力、工部门工作关系质量? 她特别对于下列感兴趣: 法律制度对于社会过程的影响、工作环境的歧视、性别、公共管理社会学。来信请寄到: costiana_stan@yahoo.com



Elena Tudor 是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和 Research Institute for Quality of Life (Romanian Academy) 的博士生。其兴趣在于国际迁移和政策。参加过相关的研究, 和欧洲委员会与在地 NGO 合作过。来信请寄到: elenatudor7@yahoo.com



Miriam Cihodariu 是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社会学博士候选人。之前是 Johannes Gutenberg University (Mainz) 的人类学博士候选人。她有过教学和研究的经验, 最有兴趣的是叙事心智地图方法, 认为自己是这个领域的先驱之一。其博士论文研究超过 3 年的庆典与小区叙事。更多信息可到: <http://miriamcihodariu.com/index.html> 来信请寄到: miriam.cihodariu@gmail.com



Mihai-Bogdan Marian 拥有法律学位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两个硕士学位分别来自国家安全和国际环境安全领域。现在是博士生。兴趣是社会变迁、全球化。现在也聚焦在这些主题上。来信请寄到:
mihaimarb@yahoo.com



Lucian Rotariu 是 Faculty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的博士生。过去3年他从事了偏差和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来信请寄到:
stefan.rotariu@sas.unibuc.ro



Monica Alexandru 是在 Exact Research and Consulting (Bucharest) 工作的社会学家, 其从2012年取得博士学位, 论文是关于国际迁徙、社会流动。最近她和国际组织和研究单位合作研究人口迁徙和贩卖的研究。来信请寄到:
alexandru_monica@yahoo.com



Bálint Telegdy 现在是 Sapientia Hungarian University of Transylvania 的助理教授。他从 Babeş-Bolyai University 取得社会学硕士, 研究区域不平等和社会问题。现在正在撰写罗马尼亚社会学的历史。其他兴趣包括了转型社会学、制度信任、社会网络分析。来信请寄到:
telegdyb@yahoo.com



Cătălina Petre 是在 École Doctorale en Sciences Sociales,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的博士生。最近获得了比利时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的奖学金, 将从事4个月的日常生活社会学研究。她对身体社会学、非语言沟通、组织社会学、人力资源管理有兴趣。现在从事沟通、组织社会学和人力资源管理的计划。博士论文学位是“年轻女性对于罗马尼亚社会主流的审美观”
来信请寄到:
gulieacatalina@yahoo.com



Oana Mara Stan 从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毕业, 取得心理学和社会学学士, 管理学硕士, 社会学博士。过去8年来是跨国媒体和娱乐公司的人资专家。期研究兴趣包括了比较社会研究的实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乡村发展、生涯规划。现在在国际研究团队 Crant 中研究人评量和劳动关系。来信请寄到:
oanamara2000@yahoo.ca